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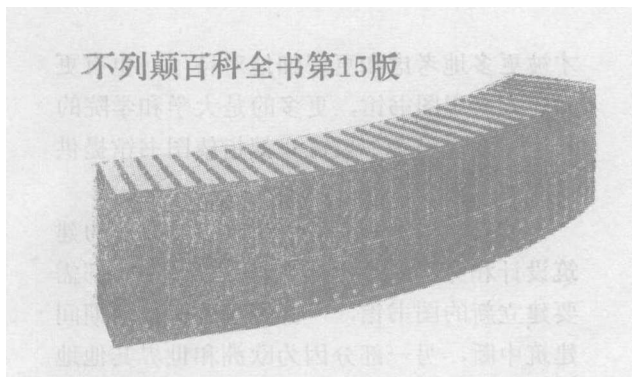


图 书 馆 (续完)

王培章 耿济安 译校

由橱柜形成的小间里有为读者使用的固定着的凳子,这样,读者就可以够到书桌上的书,并利用窗外来的充足的光线进行阅读。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 甚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图书馆还保存有“长房间”——老制度的遗迹。然而,锁链藏图书的形式被淘汰却伴随着出版物型式的改变——越来越便宜、大量的出版物,特别是比较小型的出版物的出现——使有可能采用墙壁书架。墙壁书架使有可能更好地利用建筑物的高度——墙越高,放的书越多。此外,锁链的废除,使有可能把图书从架上拿下来去阅读,可以按人们的愿望去布置座位;这样,没有塞满桌子和凳子的墙壁就可供实验用,主要的室内面积可以留有空地或为塑像和其他各种展览,如橱柜提供优雅的环境。有时,宽敞和陈列比提供研究的便利受到更好的赞赏。这种心情可以用维也纳奥地利国立图书馆的普律克沙

(Prunksaal)作例子,它是1723—26年根据约翰·菲谢尔·冯·厄拉切(Johann Fischa Von Erlach)的设计方案建立的。它包括用大理石科林斯圆柱(Corinthian Columns)装饰的华丽的法尤克(Farogue)大厅;中间放着查理六世的塑像,沿墙放着帝国的其他王子的塑像。牛津和剑桥学院的许多图书馆——在剑桥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列恩图书馆(Wren library),在牛津的基督教堂图书馆——也同样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也许这种图书馆设计的最盛行的是不列颠博物馆的皇家图书馆,建于1823年

和1826年期间,收藏的乔治三世国王的图书1823年为博物馆获得。它是一个拥有画廊的,长度相当于300英尺(大约一百米)长的房间,墙壁排列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

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 不列颠博物馆著名的阅览室是对实用建筑设计的完全创新。到十九世纪中期,当时现有的一些阅览室所提供的空间已经容不下众多的读者。1854年图书馆长安东尼奥·帕尼兹(Antonio Panizzi)把“工程世纪”非常出色地应用到图书馆的建筑上去,设计出一个铸铁书库,外部围以墙壁,有间隔很宽的砖柱,可容纳大约150万册图书;这个书库围绕并支持着大而圆的阅览室,该阅览室以放射形状安置了几排供450个读者所用的阅览桌,自然根据圆形方案,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这种阅览室的墙为公开查索的二万五千册普通参考书提供了地方。这个“铁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宽广的与阅览区非常接近的图书馆,减少了火灾。事实证明,通过剔除砖结构而代用金属,它非常节省空间。现代书库的构造已在它的基础上大大地改进了,用钢来代替铁,普遍地节省空间;但是这个书库的基本方案仍然为以后的书库所沿用。

近代时期 帕尼兹的发明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图书馆设计的实用建筑主义上。从那时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图书馆的设计多半以建筑学家对图书馆所执行功能的解释为转移,但是他们的建筑很少能表示出在这些建筑里实际上进行什么工作。一般的风格

倾向于巨大的纪念性的建筑，以适合从事崇高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建筑物。图书馆员对于设计很少有发言权——的确，一般说来，多半很少能参加意见——除了表示分配书库、阅览室、行政管理区的空间比例以外。

建筑物的专门部分是划出作书库的，毫不奇怪，考虑到图书馆藏书的不不断增长，书架常常被设计成高塔式的。阅览室则作为一些单独的建筑单元来处理，有许多情形，既不联系与书库的比例，也不联系进出书库的通道。供行政管理和日常图书馆作业（如采购的管理和纪录、编目、装订等等）所用的空间，常常在设计上没有适当重视书库、阅览室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固定职能的设计使得灵活使用图书馆空间的可能性很少；而且往往只有——如果有的话——有限的扩张可能性。图书馆馆员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不得不忍受不必要的高的阅览室、宽阔的走廊，而且有时还有雄伟的大厅和阶梯，并为之提供灯光和暖气，读者要登不要必的阶梯，从入口到阅览室，从目录厅和参考书架回到自己阅览的地方，往往要步行很长的距离。

大的研究图书馆很少提供读者入库的条件（而且也不是经常需要应当这样做）。然而，公共图书馆，虽然它们经常也是藏书于大楼里面，很早（十九世纪90年代在英国）就发现采用向读者开架的办法是可能的。开架使有高架的书库对读者不适用，开架促使采用图书的分类排列，以便读者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他们特别有兴趣的专题和图书。

对图书馆的建筑设计 and 结构的态度的显著变化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研究一下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对于图书馆的历史和它的发展是有相当意义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在这战争期间曾需要迅速提供准确的情报；无疑对传统的图书馆工作很不满意，因而更多地对图书馆和它们的特点抱批判态度。后来，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方便

才被更多地考虑和更仔细地对待了。也有更多的人利用图书馆，更多的是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也有很多一般民众都指望图书馆提供情报、学习和消遣。

再者，建筑技术的重大改进，使新的建筑设计和方法有了可能，而且许多地方都需要建立新的图书馆，一部分是因为战争期间建筑中断，另一部分因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图书馆被战争破坏或损毁。旧式的图书馆由于它们大而无伸缩性的结构，而不再受欢迎了。

对图书馆设计的新看法，进一步被模块式建筑的发展所鼓舞。在模块式建筑中，基层面积由四角上的结构柱明确地分成相等的长方形，柱在楼内是唯一的承重结构。这些区域由不承重的墙，书架和自由移动的设备再分为小区域；结果在理论上，建筑物内除了柱以外（当然还有阶梯、电梯、暖气设备、管道和水槽），没有固定的和不可移动的东西，因此，一个区域的使用，可以扩大或任意改变。

这样一种建筑的有用性用不着强调，不过，模块式对建筑师会有约束性的影响。如果它是在基本上方形的建筑物上，可能是最有效的。因此，就有一个现实的危险：即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的建筑物可能是平淡无奇的，或者甚至是丑陋不堪。

对未来的展望 如果图书馆建筑的主要要求之一，即最大限度的可变性，已由使用模块式而具有了，那末还有许多别的问题仍必须由图书馆的设计者严肃考虑。从目前看来，普遍认为，科研图书馆的藏书正以每16至20年翻一倍的速度增长——甚至最大的国立图书馆也是以这样的速度增加。这样的增长很难无限地维持，因此，图书馆员（和他们的负责团体），现在正被迫制定对付这个问题的战略计划。对阅览场所的要求也不断增长，很可能社会将要求对这个和其他要求得到同情的反应，包括延长开放时间，更方

便和更舒适的阅读和研究条件。

现代图书馆学

以上提到的图书馆，大部份都维护得很好，并且成为管理它们的学术机构或社会团体引以自豪的资本。但是，特别是科研图书馆装设没有面临藏书数量增长一类的大问题那是没有用的：在传统来源和新的出版中心图书生产的急骤增长中，如何保持藏书的全面性和平衡；如何适应当地的，为对付重要计划而对藏书深度的要求的变动性；如何解决经费和空间问题上增大压力的困难；有时还有如何避免为了占有某种或某几种可以借阅的图书而发生敌对的冲突。

对图书馆问题的实验性解决办法。

组织之间的合作 上面所列举的问题都是一些突出的问题——各地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都没有被忽视。如果说令人信服的解决它们的方法还没有找到，那末至少有许多权宜之计正在调查和试验之中。首先是通过采购计划使藏书合理化，如美国的法明顿计划（Farmington）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斯堪的计划（Scandia），根据这个计划，个别图书馆自愿同意尽可能深地收藏某些学科和学科领域的藏书，同时继续保持它们在其它学科领域中的藏书特色（实际上在西德，同样的计划正在德意志研究会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的支持下执行）；也有为采购和保藏不寻常的图书而采用合作中心的办法，如科研图书馆中心（原先的芝加哥中西部馆际交流中心）；采用联合贮存用处不大的资料；统一或合作编目，以使编目工作在国际上成为共同的活动为最终目标，卡片目录款目由每一个国家的编目中心来提供；采用每一本出版的书印上目录款目的办法；建立计算机技术处理中心的网络和国际合作。虽然这些实验展示了许多希望，然而它们是不是足够彻底或者已达到了问题的根源，还不明确。也不能肯定学术机

构愿意考虑缩小他们所珍视的政策和行动的独立性。一些更彻底的重新设计可能对图书馆的活动作一些根本上的重新考虑，特别是在非常大的图书馆——在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出现之前也许是必要的。

缩微图书 对于许多图书馆来说，尽可能地限制每个图书馆目前的那种扩张状况，看来是正确的，这样，只有一些特定的图书馆，如国立图书馆，由于它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应当继续全面地收集和保存图书。但是有某些权宜的方法可以使图书增长的许多问题得到暂时的缓和。讨论最多的一个方法是用缩微本代替原始文本。这种文本采用缩微胶卷或将此概念扩展到缩微平片或缩微卡片。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权宜方法。但是迄今还有许多不利的方面：缩微的代价很高，虽然这种费用可以适当与节省可贵的图书的空间费用对比；大部分缩微阅读装置是很笨重的和不方便的，可能会使不得不长时间使用它的读者感到难受。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善本书和有价值的图书，当学者可能需要仔细检查印刷、纸张、版面设计等详细情况时，缩微品或许是不可靠的和引人误解的。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以消除或减少这些缺点，特别是那些不得不——或者是由于找不到原始文本，或者是由于藏书空间的限制——使用缩微品的图书馆。

空间节省技术 节省空间的另一个方法是密集排架；简单地说，就是把标准的书架排在带有滚珠轴承轮子的轨条上，可以推得紧紧地挤在一起，这样在任何一定的面积上大大地增加了藏书量。缺点是代价高，需要非常坚固的楼板结构，不利于读者的使用。

对发展的预测 这样一些装置的采用，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地影响图书馆的设计和图书馆的工作程序，越来越经常被使用的机械的和资料处理装置同样也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在未来图书馆的业务

上,特别是在流通系统,馆际编目和情报检索中起重大的作用。储存和使用视听资料,电影片资料,录音录象磁带,计算机磁带等的设施,在未来图书馆中都必须装备。

很清楚,图书馆事业是处在一个很大潜在发展的时期。首先是需要重新评价和基本上新考虑关于图书馆在社会上的地位。已往图书馆所享有的传统独立性因需要合作而不得不改变;例如,标准的工作程序必然会赢得更普遍地赞同,自动化——可以帮助图书馆员比传统方法更有效地利用他所管的资料——的出现,在这点上很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

重要的是图书馆本身自己应该加快作出这种改进,而不要拖延到重大变革降临到头上时再行动,因为目前反应图书馆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的已经有一种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开始要作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处理。虽然许多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对地区的积极性抱有大的信心,而对强迫的统一和集中的效力抱不信任态度,但现代世界经济和技术意味着地区的支持和积极性不能单独解决问题。许多国家都有一个政府部门对图书馆负责,并配备有一组检查官,以保证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和实现这些务服工作的一致。这样的组织在东欧一些国家已经存在,法国和意大利很久以来就有了他们的图书馆管理局。挪威最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只是有一个国立图书馆咨询处(Biblioteks tjensten),能明确地规定主动和独立的活动范围。在英国,已经采取步骤建立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但迄今只管理一些国立图书馆。

先进国家的图书馆制度和工作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制度和

工作方法。在两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之间的大量接触中产生了一个设想,就是:先进国家实行得好的东西,在其他国家中也会同样的好。现在许多人认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设想,可能更合乎需要的是公共教育机构,因为图书馆应当致力于体现和反映地方的文化形态。国际图书馆协会,包括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和国际文献联合会(FID),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积极的会员,正在为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会议地址上起非常大的作用,以便讨论这些问题。

虽然注重了对图书馆工作的研究,但对于最近图书馆现状的更深入的含义很少研究。可能是为时太早或所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因此尽管客观地重新估价是非常需要的,而图书馆专家还是不可能对他的专业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述图书馆实际工作问题的文献很多也很好,但是,看来大部分图书馆员太忙于每日的活动和管理的日常任务,而不可能用很长时间去进行他们的专业研究。关于图书馆历史的著作,一般倾向于雷同的描述,而缺乏深入地研究——因为这样的问题有大量的原始资料。讲图书馆的早期历史有最好的著作,例如约翰·威利斯·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的“图书的管理”(The Care of Books, 1900年出版),F·沃莫尔德(F Wormald)和C·E·赖特(C.E.Wright)的“1700年前的英国图书馆”(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1958年出版)。图书馆协会——包括世界上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的工作——看来也同样致力于讨论现时的专业问题。